

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风险导向审计定价

——基于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郝玉贵,陈丽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中国转型期的公司法律风险和政治联系对于新兴的审计市场均衡定价至关重要。以2007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间9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越高则审计收费越高,上市公司政治联系越强则审计收费越低,而且国内“十大”事务所对政治联系较弱的上市公司收取了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一结果表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定价具有风险含量。

[关键词]法律风险;政治联系;审计定价;风险导向审计;审计市场;审计收费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3)01-0095-09

一、引言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司法体系和政府干预等特征影响着我国新兴审计市场的演进,我国审计市场不论是“脱钩改制”,还是“做大做强”,或是国际化发展,无不与我国较弱法律环境下的政府推动相关联。从市场要素看,审计市场供需双方均存在法律风险和政治关联,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实现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的均衡定价。一方面,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因各地区改革进程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异,使得审计需求和功能发挥有所不同。La Porta认为,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资本市场较为发达,投资者的决策更加依赖财务报告的质量。为了获得可靠的财务报告,投资者会对外部审计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1]。高质量的审计必然要求更多投入,因此,变化中的法律环境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继而如何影响审计定价决策,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生态系统理论,企业生存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众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正如Epstein所提出的,政府可被视为竞争性的工具^[2],企业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往往是依靠与政府的良好联系。随后的许多研究表明,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政治联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发挥了替代市场的功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中普遍存在企业的寻租行为,企业寻租能力的大小和获益的多少由它所拥有的政治联系的强弱程度决定。审计师的执业风险成本往往受到这些特定制度背景的影响^[3],审计收费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基于此,在不同的法律风险下,政治联系强弱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审计收费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收稿日期]2012-08-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2YJA790040)

[作者简介]郝玉贵(1963—),男,河南伊川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与内部控制;陈丽君(1986—),女,浙江温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与内部控制。

本文从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的概念和相关研究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7年开始实施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选取2007年34家、2009年35家、2010年27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不同于陈小林、潘克勤^[4]和冯延超^[5]的单因素研究,本文将法律风险和政治联系双因素同时纳入审计收费模型中,拓宽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于已有文章中法律风险采用公司当年公告中披露的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作为替代的做法,本文采用中国法律风险管理网站上公布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更全面准确地衡量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以保证研究的信度。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向飞等认为,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或企业外部的法律环境发生变化而对企业造成的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6]。徐永前等人认为,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在于企业违背法规并给企业带来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7]。本研究将企业法律风险界定为在经营活动中企业疏于法律审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未能按合同和法规约定进行,导致产生了相应的经济纠纷、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给企业在经济和名誉上造成重大损失。作为上市公司整体风险的风向标,法律风险的大小充分反映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并已经成为衡量该公司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 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的研究

Simunic等人的研究表明,事务所在进行审计收费时受到法律环境影响,会根据其受到诉讼风险影响的可能性来调整审计收费^[8]。Choi等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法律环境状况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行直接比较,发现审计师的审计费用和国家的法律环境状况呈显著正相关,法律环境越好的国家,审计师的审计收费越高^[9]。国内学者王良成等人基于“法律环境—审计风险—审计定价”的逻辑推理,研究了法律环境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师收费会考虑到法律环境的影响^[10]。Venkataraman等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前会有相对较高的审计收费是因为存在相对较高的法律风险^[11]。冯延超采用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8年的经验数据,以当年公告中披露的违规处分、诉讼仲裁等法律事件作为上市公司微观法律风险的替代,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5]。

上述文献表明,从宏观角度研究法律环境的风险对审计决策影响的文献较多,而从客户微观角度观察法律风险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我国2006年实施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为背景,研究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二) 政治联系、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收费研究

Fan等人认为政治联系是公司的CEO曾经或现在于政府机关或军队任职^[12]。杜兴强在借鉴了Fan等人的定义后提出,公司的所有高管中只要有一名曾经或现在于党委、人大或政协常设机构、政府、检察院、法院、人民银行任职,或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就可以确定该公司具有政治联系^[13]。本文借鉴了杜兴强对政治联系的界定,但是对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不加以区分,只要符合其中一种就认为具有政治联系。

Gul研究发现,在马来西亚金融危机期间,事务所审计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审计收费要高于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14]。陈小林等以2001年至2003年271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治联系越弱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而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风险溢价^[4]。黄建新等研究发现,政治联系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小所或低质量的审计师^[15]。梁莱歆等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大型审计师^[16]。潘克勤考察了IPO前民营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与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具有此类政治关联的公司倾向于选择大型审计师,在选择大型审计师后支付了相

对较高的审计费用^[17]。

上述实证研究大多是以法律风险或政治联系为单一解释变量,实证检验各自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鲜有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定价的影响的。而且目前国内研究文献中法律风险是采用公司当年公告中披露的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作为替代,鲜有运用法律风险指数作为替代变量研究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法律风险指数、政治联系与审计定价关系问题,不仅有益于审计定价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审计定价的实务决策。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审计风险成本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

Simunic 首次提出了审计收费模型,认为潜在的民事赔偿责任要求的风险补偿和审计过程中时间、人力和物力投入等审计资源成本应包括在审计收费中^[8]。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高低与企业管理水平相关,法律风险高,表明该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管理存在很大缺陷,该公司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和真实性会受到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减少损失,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要求会计师在审计此类企业时,要扩大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增加审计程序,有时还可能需扩大高素质会计师的队伍,延长审计时间等。因此,会计师为了补偿审计成本,会向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另外,法律风险较高的企业,其声誉容易受损,产品形象、融资能力也易受到影响,因此无法确定该企业未来持续经营的情况。基于审计需求的保险假说,审计不仅具有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被审计单位经营状况的信息价值,还具有为企业所有者提供补偿损失的保险价值。从本质上看,审计是风险的一种转移机制,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所有者作为投保人可以将其所面临的财务信息风险全部或者部分地转移给会计师。会计师作为保险人,被审计客户本身法律风险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预期的保险赔偿概率,为了补偿预期的诉讼损失,会计师必然会向具有较高法律风险的公司收取较高的审计费以弥补审计风险溢价。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1。

假设 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成正相关,即法律风险越高,审计收费越高。

(二) 政府联系与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认为,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该要素的机会成本小于其带来的收入时,会形成一定的剩余,就相当于获得了“租”(或称“经济租”)。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寻租行为时有发生,但企业政治联系的强弱决定了其寻租能力的高低。企业能从政府获得支持和保护的多少,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会计师是企业“审计失败或审计合谋”的风险共担者,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和保护力度决定了会计师所能获得的相应保护力度,因此企业的政治联系影响会计师的执业风险。总的来说,会计师在审计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时有两大优势:第一,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剩余诉讼风险比较低。第二,会计师的诉讼风险也能得到降低。因此,会计师在审计具有较强政治联系的公司时可以采取较少的审计程序来规避风险,从而导致审计成本和审计收费降低。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

假设 2: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上市公司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即政治联系越强,审计收费越低。

(三) 事务所规模收费与市场势力理论

规模收费理论认为,大事务所在竞争性市场上比小事务所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规模的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并不是这些大事务所具有的垄断地位^[18]。也有学者认为大事务所之所以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一方面是由于规模提升带来独立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大事务所有更高的发现错报的能力和更高的审计投入^[19]。从审计供给方来说,因提供更高审计服务质量而在被审计客户身上花费额外费用可以向被审计客户提出补偿要求,并在审计收费中得到体现^[20]。从需求方来说,上市公司获得的大事务所提供的高质量审计服务可以使公司质量的信号得

以传递,使公司价值得以提高、融资成本得以降低,因此审计需求方愿意接受大事务所提出的高价。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在被审计客户面前大事务所的议价能力更强,因此能够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审计定价很大程度上是受双方力量对比或议价能力的影响,审计收费实际上是审计师市场势力与客户影响之间均衡的结果。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服务的供给方,在客户面前的议价能力越高,获得的审计费用越高。另一方面,客户的政治联系强弱影响审计合同议价能力。客户和政府联系较强,客户得到政府保护程度较高,客户的议价能力就较强。相对而言,审计定价较低,但是不低于限价;反之,政治联系较弱的客户,议价能力较弱,审计定价存在溢价。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十大”事务所向政治联系较弱的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审计溢价。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7年、2009年、2010年各40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取样本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和未披露审计收费的上市公司,若本文所需的其他指标无法取得,则我们也将该上市公司剔除。经过筛选,本文最终取得2007年34家、2009年35家和2010年27家三年总共96家的样本。本文采用的相关财务指标数据取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此外,因为该数据库中披露的审计费用存在不规范和缺失现象,我们另外通过巨潮资讯网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对上市公司有关的审计收费数据进行了详细检索,手工查阅上市公司年报,取得了较完整的审计收费数据。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子公司数量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查找取得。2007年、2009年、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排行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代表指数取自于中国法律风险管理网站。本文统计分析过程采用统计软件SPSS15完成。

(二) 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说明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审计费用	LNFEET	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付给审计师的费用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	LITIGATION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
解释变量	上市公司政治联系	PC	公司全部高管中若至少有一名曾经或现在在党委、政府、人大或政协常设机构、法院、检察院、人民银行任职,或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PC=1;否则PC=0。
	事务所规模×政治联系	BIG10×PC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排名,当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年度排名中是前10位之一,BIG10=1;否则,BIG10=0。
控制变量	资产规模	LNASSET	被审计客户当年年报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审计客户复杂程度	SQSUBS	上市公司在会计期末拥有的、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数目取平方根
	公司财务风险	CR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公司盈利能力	ROA	(利润总额+财务费用)/平均资产总额	

被解释变量为审计收费(LnFEET)。根据传统的审计收费模型,本文选取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收费金额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法律风险(LITIGATION)、政治联系(PC)和事务所规模(BIG10)。其中法律风险(LITIGATION)采用北京赛尼尔风险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出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测评系统”

给出的法律风险指数。

控制变量包括被审计客户规模(LNASSET)、审计客户复杂程度(SQSUBS)、被审计客户财务风险(CR、LEV)、被审计客户盈利能力风险(ROA)等变量,以便控制除了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以外的其他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

(三) 模型设计

根据 Simunic 审计收费的实证模型,结合我国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建立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的回归模型如下:

$$\ln FEE = \beta_0 + \beta_1 LITIGATION + \beta_2 PC + \beta_3 BIG10 \times PC + \beta_4 LNASSET + \beta_5 SQSUBS + \beta_6 CR + \beta_7 LEV + \beta_8 ROA + \varepsilon$$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统计特征数据,包括没有进行对数转换的审计收费。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的最大值为15.69,最小值为12.21,均值为13.19,说明各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存在较大差距。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EE	96	672366.67	739284.17	200000.00	6500000.00
LN FEE	96	13.19	0.59	12.21	15.69
LITIGATION	96	41.69	29.22	10.68	87.90
PC	96	0.55	0.50	0.00	1.00
BIG10 × PC	96	0.15	0.35	0.00	1.00
LNASSET	96	21.13	1.79	16.01	27.30
SQSUBS	96	2.11	1.28	0.00	5.83
CR	96	2.84	6.20	0.00	35.50
LEV	96	1.55	3.38	0.02	27.92
ROA	96	0.26	1.59	-3.34	12.76

2007年、2009年、2010年三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平均为41.69,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最高达到87.90,而最低的仅为10.68,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法律风险的能力差异较大。

样本公司的政治联系均值为0.55,表明样本中55%的公司拥有政治联系,也反映了大多数上市公司目前正追求与政府取得政治联系以获得寻租能力的现状。

同时结果表明,企业业绩和财务杠杆数据也相对分散,说明上市公司质量存在较大差距。

(二) 相关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56,明显小于0.8,变量之间的关系微弱,我们可以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审计收费与事务所规模与政治联系的交叉项正

表3 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LN FEE	LITIGATION	PC	BIG10 & PC	LNASSET	SQSUBS	CR	LEV	ROA
LN FEE	1.000								
LITIGATION	-0.030	1.000							
PC	-0.025	-0.119	1.000						
BIG10 × PC	0.216*	-0.288**	0.372**	1.000					
LNASSET	0.543**	-0.556**	0.248*	0.325**	1.000				
SQSUBS	0.175	0.187	-0.094	-0.155	0.087	1.000			
CR	-0.262*	-0.366**	-0.099	0.004	0.039	-0.047	1.000		
LEV	-0.0360	0.348**	0.000	-0.129	-0.413**	0.005	-0.185	1.000	
ROA	-0.005	0.116	-0.191	-0.058	-0.236*	-0.249*	-0.033	-0.145	1.000

注: *、** 分别表示 5% 和 1% 的水平显著。

相关,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因而与假设3的预期一致。

客户资产规模 LNASSET 与审计收费代表变量 LNFEET 之间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这是由于审计客户的资产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就越多,注册会计师需要相应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和本文预期是一致的。

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指标流动比率 CR 与审计收费 LNFEET 负相关,且在5%水平下显著。流动比率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该比率越高,短期偿债能力越强,审计风险越低,因此与前文控制变量的假定相吻合。

(三)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4中模型1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修正后的R²分别为0.450、0.446、0.451和0.493,表明模型1至模型4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1至模型4的F分别为13.930、13.753、12.157和12.547,模型1至模型4整体通过了F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这些统计量表明回归结果的分析基础是可信的。

表4 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因变量 LNFEET)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Constant)	7.200** (0.775)	8.095** (0.639)	7.324** (0.782)	7.192** (0.753)
LITIGATION	0.005* (0.002)	—	0.005* (0.002)	0.006** (0.002)
PC	—	-0.214* (0.095)	—	-0.276** (0.096)
BIG10 × PC	—	—	0.153 (0.136)	274* (0.137)
LNASSET	0.267** (0.034)	0.240** (0.030)	0.259** (0.035)	0.272** (0.034)
SQSUBS	0.046 (0.038)	0.059 (0.037)	0.053 (0.038)	0.040 (0.037)
CR	-0.014 (.008)	-0.024** (0.007)	-0.014 (0.008)	-0.016* (0.008)
LEV	0.038* (0.015)	0.043** (0.015)	0.037* (0.015)	0.040** (0.015)
ROA	0.078* (0.031)	0.071 (0.032)	0.078* (0.031)	0.064* (0.030)
N	96	96	96	96
F	13.930	13.753	12.157	12.547
Adj-R ²	0.450	0.446	0.451	0.493

注:*、**分别表示5%和1%的水平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模型1显示在不考虑政治联系的情况下法律风险对审计收费呈正影响,并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法律风险越高,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风险成本越高,审计收费也越高。假设1通过验证。

模型2显示在不考虑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政治联系在5%水平下对审计收费呈显著负影响,这说明企业政治联系越强,被审计客户的政治风险越低,审计风险成本就越低,那么审计收费也就越低。假设2通过验证。

模型3显示在不考虑政治联系单变量情况下事务所规模与政治联系交叉项对审计收费呈正影响,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十大”事务所的议价强势为客户政治联系强势所抵消,因而对审计定价影响不显著。

模型4是全变量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对审计收费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正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设1。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审计收费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负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设2,说明公司政治联系越强,审计收费越低。BIG10与PC的交叉项对审计收费在5%水平下呈显著正影响,说明“十大”在政治联系弱的上市公司中获得了更高的审计收费,从而证实了假设3。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均对审计收费呈显著正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对审计收费呈显著负影响,这些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一致。期末合并报表中子公司数量对审计收费呈正影响,但显著性水平不高,表明审计师可能并没有过多考虑此方面审计成本的增加。

另外,本文区分深交所样本和沪交所样本,回归结果见表5。深交所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呈显著正影响,而政治联系与审计定价呈负影响但不显著,表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考虑法律风险因素。沪交所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对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影响,但法律风险对审计定价正影响却不显著,由此表明沪深交易所审计市场定价存有差异。

(四) 稳健性检验

将政治联系变量按潘克勤的界定^[17]进行测试,即政治身份限定于实际控制人,如果实际控制人担任区县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职务(但不包括其政府机构任职背景),本文就认为其具有政治联系。我们进一步将政治身份划分为国家级、省区级、地市级、区县级和无政治身份五个等级。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与前述一致。

表5 深沪交易所分组回归结果(因变量 LNFFEE)

自变量	深交所样本	沪交所样本	全样本
	系数	系数	系数
(Constant)	9.723 ** (0.889)	6.318 ** (1.354)	7.192 ** (0.753)
LITIGATION	0.003 * (0.002)	0.006 (0.004)	0.006 ** (0.002)
PC	-0.120 (0.087)	-0.541 ** (0.182)	-0.276 ** (0.096)
BIG10 × PC	-0.127 (0.127)	0.558 * (0.248)	274 * (0.137)
LNASSET	0.148 ** (0.040)	0.320 ** (0.060)	0.272 ** (0.034)
SQSUBS	0.089 ** (0.032)	-0.010 (0.075)	0.040 (0.037)
CR	-0.014 * (0.006)	-0.006 (0.104)	-0.016 * (0.008)
LEV	0.038 (0.020)	0.042 (0.021)	0.040 ** (0.015)
ROA	0.044 (0.094)	0.052 (0.040)	0.064 * (0.030)
N	50	46	96
F	7.125	7.326	12.547
Adj-R ²	0.510	0.525	0.493

注:*、**分别表示5%和1%的水平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和政治联系对审计收费均具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越高,则审计收费越高,表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实施中较充分地考虑了公司法律风险的影响。因为公司法律风险较大时,审计师为了确保审计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事务所可能需要调整审计策略,增加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和审计时间,并指派具有更高业务素质、更熟悉法律事务的审计人员参加审计,这些调整使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有所提高,为了补偿这些审计成本,事务所就有必要提高审计收费。此外,审计法律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应该更为谨慎,否则,极可能使审计师卷入诉讼等法律事件,因此对审计师而言,存在较大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预期损失,他们需要收取更多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审计收费也越高。

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政治联系越强,审计收费越低。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寻租理论下,具有较强政治联系的被审计客户遇到经营困境时获得政府支持的力度较大,经营失败的可能性降低,审计风险成本较小。即使存在财务报告舞弊等行为,凭借其强大的政治联系,它也可以获得政府的保护从而避免遭受处罚或减轻处罚。因此,这类企业因被发现舞弊而遭受处罚的可能性和损失都要低于政治联系较弱的公司。如果存在舞弊的公司未受到处罚,相应的审计师也就难以被定罪处罚。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审计师在审计具有较强政治联系的公司时会采取较少的审计程序,因此也会降低审计

收费。

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十大”事务所在政治联系较弱的上市公司中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也体现了事务所规模收费和市场势力理论下大规模的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同时,本文也发现,沪深市场审计定价受法律风险和政治联系的影响存在差异,这表明沪深市场审计风险定价存有差异。

本文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避免了从单独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或政治联系来研究它们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而是研究这两个因素共同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有所拓展和创新。此外,本文采用企业法律风险指数作为法律风险替代变量,效果较好。由于能搜集到的法律风险指数的上市公司样本只有2007年的40家、2009年的40家、2010年的40家,缺失2008年的数据,在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的后,只获得了96家,样本量上还不是很多且不连续,这是后续研究需要弥补的不足。

(二) 政策建议

上述实证结果揭示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对风险导向审计定价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增强上市公司管理层法律风险控制意识,健全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降低法律风险。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对审计收费呈显著正影响,公司法律风险的有效控制能有效降低审计费用,增加收益。

第二,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影响,因此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影响审计师的正常风险判断。监管部门也应该辨识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联系,并应密切关注这些政治联系可能导致的腐败问题。

第三,进一步完善法律环境,健全审计法律诉讼和赔偿制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定价决策中应考虑法律环境的风险,采取最有利的方案。优质的法律环境会促进审计市场更有效率地运行。建立以民事责任为主的法律监管体系,将会加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形成对注册会计师的有效监督,促使其勤勉尽职,减少不规范的审计行为。国家还要加大对不法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制裁力度,建立民事赔偿机制,加快修订注册会计师法规,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 [1]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1131 - 1147.
- [2] Epstein E. The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9.
- [3] 郝玉贵,孙永新,危宝云.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作业成本定价模型[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1):40 - 47.
- [4] 陈小林,潘克勤. 法律环境、政治关系与审计定价——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 2007(S1):90 - 95.
- [5] 冯延超,梁莱歆.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3):75 - 81.
- [6] 向飞,陈友春. 企业法律风险评估[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1.
- [7] 徐永前.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建设操作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
- [8] Simunic A D.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 161 - 169.
- [9] Choi J H, Kim J B, Liu Xiaohong, et al. Audit pricing, legal liability regimes, and big 4 premiums: theory and cross country evidenc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55 - 99.

- [10]王良成,陈汉文. 法律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J]. 财贸经济,2010(4):69-75.
- [11]Venkataraman R, Weber J P, Willenborg M. Litigation risk,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fees: evidence from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 1315-1345.
- [12]Fan J, Wong T J, Zhang Tianyu.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 324-353.
- [13]杜兴强,郭剑花,雷宇.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J]. 金融研究, 2009(11): 158-173.
- [14]Gul F A. Auditors' response t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ronyism in Malay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6, 44: 931-963.
- [15]黄建新,张会. 地区环境、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3): 44-52.
- [16]梁莱歆,冯延超,杨继伟. 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2): 39-46.
- [17]潘克勤. 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自律型治理与审计需求——基于IPO前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4): 57-65.
- [18]Niemi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pricing: evidence from small audit firms[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4, 13: 541-560.
- [19]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 183-199.
- [20]Abbott L J, Parker S, Peters G F,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audit fee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3, 22: 17-32.

[责任编辑:黄燕]

Legal Risk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Pricing of Risk-oriented Audi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Chinese Securities and Audit Market

HAO Yu-gui, CHEN Li-jun

Abstract: The legal risk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a company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are crucial to equilibrium pricing of the rising audit market. This study selects 96 public companies in the years of 2007, 2009 and 2010 as samples, and adop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egal risk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public companies and audit fe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under risk-based auditing pattern, the higher legal risks public companies get, the higher fees will be charged; the strong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public companies acquire, the lower fees will be charged. In addition, the top ten audit firms in China have charged a higher risk premium on those public companies who have low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se consequences indicate that the pricing of risk-oriented audit considers the risks.

Key Words: legal risk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udit pricing; risk-oriented audit; audit market; audit charge